



「必也正名乎？」—— 非典型視角下原民學生身分的意識與選擇

「必ずや名を正さんか」——非典型的な視点による原住民学生の身分
“Must Names Be Rectified?”:
Awareness and Choice of Indigenous Students’ Status from an Atypical Perspective

文・圖 | 丁少威 Adup Maciang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四年級)

「我不能選擇你，你能選擇我，這還能算是我的選擇嗎？」當法律不再要求更名改姓，只消在文件上並列傳統名字就能取得原住民身分時，「原住民」這三個字，對年輕世代而言，意味著什麼？憲判字第4號判決與《原住民身分法》的修正，在制度上解構了姓氏的藩籬，讓身分認定回歸個人認同的自由。選擇身分的背後，不僅是個人認同意識的彰顯，更有國家、社會、文化層面的責任。同時，透過身分的界定，亦在群體與人群之間界定了「內」與「外」的邊界，藉以區分「你」與「我」和「他」的關係。然而，當身分選擇涉及個人利益的獲取時，原本單純的歸屬，便不再純粹。基於此，



泰雅族依拉派斯（卡拉派）社家屋。（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本文欲透過兩則「非典型」的案例展開，對當前已存在的現象進行反思。

贏在起跑點——身分，是我的保護傘，而文化，我不在乎！

趙小宋（化名）是一名從小生活在台北的泰雅族學生，

目前就讀新竹的國立大學，攻讀理工學科。據其自述，他自幼即知悉自身擁有泰雅族血統，母親為泰雅族人。然而，他對於族群歷史與傳統文化無太多關注，真正引起其重視的，是原民身分所附帶的各項補助、福利措施及升學保障等

透過身分的界定，亦在群體與人群之間界定了「內」與「外」的邊界，藉以區分「你」與「我」和「他」的關係。然而，當身分選擇涉及個人利益的獲取時，原本單純的歸屬，便不再純粹。



一系列「優待政策」。

趙小宋表示，其對原住民族福利資訊的認識，主要來自學校公民與社會課程的內容、同儕間的分享討論，以及整體社會氛圍的形塑。在得知原民群體所享有的資源多於一般身分者後，他在國中階段便主動向父母提出更改姓氏，以取得原住民族身分。

在訪談過程中，筆者能明顯感受到趙小宋清楚地將身分與文化區分。他認為，只要將自身的原民身分妥善「隱藏」，在日常生活中仍可與一般生無異，且不會有人發現。然而，在面對不擅長或難度較



宜蘭縣南澳鄉泰雅文化館泰雅族背簍工法。（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高的考試時，身分所賦予的成績優待便成為其重要的保護傘。他特別提及，高中三年的及格標準依年級分別為高一的40分、高二的50分與高三的60分，相較於一般生高中三年均以60分為及格門檻，原民身分所提供的「差別待遇」在他不想投入充分準備時，提供了緩衝與偷懶的空間。最後，筆者好奇趙小宋對於泰雅族文化的態度，他表示，「並不清楚泰雅族的文化，對於傳統祭儀、工藝和族群的歷史等也不在乎。只要能贏在起跑點，獲得更多好處即可」。或許可以說，對他而言身分不是族群歸屬與認同的標誌，而更像是可運用的制度資源。

失靈的認同——身份是我的負擔，而文化，從哪開始？

徐大紹（化名）是一名來自東部，並透過「外加名額」進入國立大學就讀人文學科的阿美族學生。據他表示，他的原民身分取得，歸因於父母離異後隨原民一方家長而得。雖然擁有身份，但他對於阿美族文化了解甚少，不過，有趣的是，原民身份所賦予的補助、福利措施及升學保障等政策，徐大紹並不在意。

徐大紹表示，他對於自身身分的求索，源自高中時期探究課程以家族史的戶口名簿展開，在重新探索自身身分後，除了與族群開始連結外，也使他對成長的母土有了更多親近。徐大紹提到，成長過程中

身分的確認，本質上是權力與資源的再分配。對原住民而言，國家所賦予的身分地位，既承載了優待政策的福利給付、歷史不正義的修復補償，更蘊含了對民族語言的復振、文化知識體系的重建與傳承，及民族血脈廣衍的責任與期許。



原民的身份常給他增添困擾。同學知道他是原住民後，都會基於外在所見來質疑他的身份，由於他在外表和各方面表現上和社會主流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有很大的落差，因此也常帶給他很大的壓力與負擔，但他表示，這個身分更像是一個時鐘，雖然也讓他自身困擾與反思，但也時時刻刻提醒他自己身上還有這個身份。

此外，徐大紹也補充，他原本從父姓，但自2026年初收



花蓮壽豐鄉光榮部落（Rinahem）豐年祭。

到戶政單位寄來的變更姓名公文後便更改了。對他而言，增列拼音式的傳統族名，更能讓他時時提醒自己身上仍有這份民族血統，也時時提醒自己的身份。不過，雖然此刻徐大紹仍對於自身原民身份感到負擔與壓力，但他樂觀地說道，或許這個政策給他的影響，是在不久的未來基於時間的累積而對原民身份的認同日益深厚。

誰在做選擇——兩則案例的反思與困境

當身分的取得與文化參與間的關聯日益薄弱時，「原住

民」在法律範疇上，究竟還承載著什麼樣的意義？趙小宋與徐大紹的例子，就此看來，固然與常規認知中的「原住民」形象有所扞格，甚至顯得突兀。然而，若將時間推至一、二十年，乃至五十年後，是否將有更多類似的案例湧現？此刻所見的突兀，在未來是否仍舊顯得異常，抑或已然成為社會常態？或許無須將視野過度推向遠方，當下實已有諸多「同為原

住民」的「都市原住民」者，正處於與趙、徐二人相仿的處境中，僅是尚未被覺察而已。因此，僅靠法律層面的身分認定放寬，並不足以維繫族群的文化主體性；教育的介入、文化的重構，以及社會對原住民族多元樣貌的重新認識，均是未來須面對的課題。

因著身分制度所附帶的各項福利政策，社會上圖利與鑽營漏洞的現象日益顯著。在教育現場，多數學生的原住民族身分，除其本身因血緣自然取得者外，其餘多經由特殊狀況或程序而獲得。然而，由於學



This is a historical Japanese household register (koseki)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The document is written in both Japanes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It details the family members of a household, including names, birth dates, and marital status. The register is organized into columns and rows, with handwritten entries in Japanese and printed entries in Chinese. The top of the document includes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date and the name of the household head.

日治時期戶花蓮地區某家戶之戶口調查簿。

生年齡並不具備自行選擇或決定的行為能力，故其身分之取得與否，其實仍歸因於家長的意志與決策。然，問題在於，現行教育體系並未針對此類情境，提供如何辨識與防範投機行為的教導。因此，仍有家長打著「為子女前途著想」的旗號，使子女取得原住民族身分，此舉雖符合法律形式，卻與身分制度設立之初旨在維繫族群文化傳承與保障集體權益的立法意旨相悖。

選擇即是界限——任何選擇的背後都有其代價

身分的確認，本質上是權

力與資源的再分配。對原住民族而言，國家所賦予的身分地位，既承載了優待政策的福利給付、歷史不正義的修復補償，更蘊含了對民族語言的復振、文化知識體系的重建與傳承，及民族血脈賡衍的責任與期許。然，隨著族群認定條件順應社會變遷而放寬，門戶大

開，人數增長，雖在短時間內人口增長，實屬可喜，值得欣慰，但此舉亦將無可避免地促使族群邊界趨於流動、模糊與稀釋。

若再將視野投至未來數十年，如今的選擇是否將導致原住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與集體認同，在世代交替中逐漸淡化？屆時，原住民族是否會重蹈客家群體在語言流失與文化消失過程中的歷史軌跡，成為一個身分尚存，但族群邊界模糊的「想像共同體」？即便是「原住民」血統仍存，其身分的識別與文化辨識與主體性恐將在主流社會的汪洋中消融，徒留一個在統計數據上存在、卻在現實生活中失語的族群名稱，而今日所做的選擇與制定的政策，又應由誰來承擔責任？又由誰來承受後果？而又究竟有誰，會樂見這樣的發展？◆



丁少威 Adup Maciang

花蓮縣花蓮市人。阿美族。2004年生。目前就讀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四年級。曾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擔任實習生。關注原住民族的歷史書寫與族群記憶，以詩與小說書寫自己與族群，並記錄過去與當代的交織連結。期盼在字海中喚起記憶與認同，促進社會對歷史與族群文化的思索。